

政大蔣中正銅像處理議題論述：校史篇

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曾士榮 撰稿

過去，蔣介石一直存在著介於「神」、「魔」之間相當極端化的歷史形象，但在今日台灣的自由民主社會與尊重多元價值的大學校園之中，已經逐漸浮現將蔣介石回歸作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來加以看待的聲音與視角；誠然，正因為從「人」的角度看待歷史中的蔣介石，在尊重史料與專業的前提下，本論述便離不開以「人性」及「人權」為核心價值的理解角度。

重層歷史脈絡中的蔣介石

1. 政治大學校史中的蔣介石

現代史(民國時期)中的蔣介石具有多重的身分。蔣介石先以軍人的身分崛起，成為國民政府的領導人，並以黨政軍的多重身分，跟充滿矛盾與戰亂的現代中國史產生密切連結；相對而言，蔣介石作為政大校長的這個身分，則是個較為邊緣的身分。

由蔣介石擔任創校校長的「中央黨務學校」(政大前身)，於 1927 年 5 月 20 日創校於南京，此一創校的歷史背景，正值國民黨北伐期間爆發清黨反共事件(即結束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四一二事件」)以及國府定都南京之後，國民黨因此急需革命幹部，而創立本校。北伐統一中國之後，本校改組為「中央政治學校」；到了二戰結束後，在 1946 年本校正式與「中央幹部學校」合併改制為「國立政治大學」；隔年(1947)，本校為了配合國民政府施行憲政，遂由國民黨改隸於教育部，並改為專任校長制，由顧郁秀擔任校長，蔣介石則改為永久名譽校長。

雖然，從 1927 年「中央黨務學校」創校到 1947 年「國立政治大學」由顧郁秀出任專任校長，長達 20 年期間皆由蔣介石擔任本校校長，但他多不經手校務，各個時期的實際校務負責人，分別陳述如下：「中央黨務學校」時期，實際校務負責者為羅家倫、谷正綱與吳挹峯；「中央政治學校」時期，實際校務負責者為丁惟汾、陳立夫、陳果夫、張道藩、程天放等人；「國立政治大學」期間(1946-1947)實際校務負責者為段錫朋、蔣經國。至於，「國立政治大學」在 1949-1954 年期間，因中國大陸淪陷導致校務陷於停頓，直到 1954 年才在台灣復校，並持續到現在。(參考資料：《國立政治大學校史稿》、「政大校史」網站)

此外，根據民國人物馮玉祥在其回憶錄中指出，除了政大之外，蔣介石在民國時期的不同階段中兼任多所其他學校校長，任期或長或短，包括陸軍軍官學校(1924-1947)、海軍軍官學校(1946-1947)、空軍軍官校、陸軍軍醫學校、中央警官學校(1936-1947)、中央大學(1943-1944)，以及許多其他學校與軍官分校等校長。(資料來源：《馮玉祥回憶錄》)

2. 中國現代史上的蔣介石

蔣介石在 1936 年底的西安事變中遭到張學良等扣押，卻也開啟第二次國共合作，領導中國對抗日本侵略的「抗日統一戰線」；在抗日期間，也涉及具爭議的人權戕害事件，在此僅舉一重大案例，說明如下：1938 年 6 月，蔣介石為了阻止日軍的攻勢，經他人的建議，在未經事先知會村民的情況下，批准士兵炸毀河南省鄭州附近的黃河南岸河堤(花園口)，導致包括河南省、安徽省與江蘇省的數千個村莊，遭到決堤的黃河河水淹沒或摧毀，村民的死傷相當慘重，據陶涵(Jay Taylor)引用國民政府的官方估計，高達數十萬民眾遭到決堤河水淹死，黃河的河道也因此改道入海。(陶涵，《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上卷)》，頁 173)

1945 年 8 月日本戰敗，向同盟國投降，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成為戰勝國之一，大大提升國際地位，但中華民國隨即陷入長達四年的國共內戰的困境中，最後國府於 1949 年撤退台灣，並擬日後反攻大陸。

3. 戰後台灣史上的蔣介石

國府在蔣介石的領導下退守台灣，隨即面臨共軍渡海來臺的巨大軍事威脅，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但 1950 年 6 月韓戰爆發後，美國宣示確保臺海中立，國府得以偏安台灣，隨即透過黨國改造與政經改革等措施，鞏固在台灣上的統治。然而，國府在 1947 年二二八事件中的軍事鎮壓，以及在戒嚴期間透過戕害人權的白色恐怖，維繫其威權統治下政治社會穩定，這段歷史直到今日仍是轉型正義訴求的最主要焦點。究竟，蔣介石在二二八鎮壓與白色恐怖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

(1) 蔣介石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

最近國史館研究人員根據《蔣中正日記》及國史館典藏及出版之相關電報與檔案，重建蔣介石在二二八期間派兵赴台的過程，說明蔣介石在派兵過程的歷史脈絡與關鍵角色。1947 年 2 月，國府在山東南部遭到重大挫敗，蔣介石深受戰局困擾；當 2 月 27 日二二八事件爆發時，台灣長官公署陳儀於 2 月 28 日由台北發電報給南京的蔣介石，告知事件發生，但未言及局勢難以控制，3 月 1 日才看到該電文的蔣介石一開始並不認為局勢嚴重；但是，到了 3 月 2 日陳儀再次發電文到南京，並首次向蔣介石請兵(步兵一旅或一團)來台；到了 3 月 4 日，陳儀二度向蔣介石請兵；蔣介石收到陳儀兩則請兵電文之後，於 3 月 5 日下令派兵，電陳儀謂：「已派步兵一團並派憲兵一營，限本月七日由滬啟運，勿念。」

然而，3 月 5 日以後，陳儀與在台軍政機關給蔣介石的後續報告，呈現二二八事件愈演愈烈的局勢，陳儀也轉變先前態度，要求蔣介石增派來臺兵力，至少派遣「有紀律嚴明、武器精良之國軍兩師」。蔣介石也開始在 3 月 7-8 日的日記中表達對「台灣暴動」的憂慮，日記中有「特派海、陸軍赴臺增強兵力」的文字。此時，蔣介石已調派整編第二十一師及部分憲兵赴臺，後續尚要調遣第二〇五師，以達到陳儀兩個師的要求。3 月 9 日，蔣介石又寫一封長函，委託當時即將赴臺的二十一師師長劉雨卿，轉交給陳儀，該信件內

容，呈現出蔣介石如臨大敵，要求陳儀先鞏固臺北與基隆兩地，尤其應切實掌握港口碼頭與機場，其次應維持鐵路與公路。

3月8日夜間，部分憲兵已先在基隆登陸，到了9日午後，劉雨卿的整編第二十一師一個團也登陸基隆。其後，蔣介石十分關心所派軍隊在臺灣的軍事行動與進展，陳儀與在台軍政機關也密集向蔣介石回報軍情。然而，派軍在登陸台灣之後，實際上發生濫事拘捕、報復等情事，造成臺人異常的恐慌。這些相關訊息馬上傳到蔣介石的耳中，蔣介石乃於3月13日發電文給陳儀，要他「負責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令論罪。」不過，在此一禁令電文到達之前，軍事鎮壓已經造成台灣民眾大量傷亡；根據「臺灣政治協會」張邦傑等當時給蔣介石的報告，臺灣警備總部在禁令電文到達之後仍繼續捕殺人民達萬人，蔣介石接到張邦傑此一報告後，批示要查報，但陳儀查辦後，向蔣介石回覆並無捕殺無辜情事，爾後蔣介石也沒有深究。

3月15日，蔣介石在日記寫道：「臺灣事變自軍隊運到後，已大部救平，然亦未曾根本解決也，可知新復之地與邊省全靠兵力維持也。」同年稍後，陳儀辭職獲准，回到上海。隔年(1948)6月，蔣介石任命陳儀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要職。1950年3月，陳儀因「煽動」湯恩伯通共黨，而遭到處決。(參考資料：國史館助修蘇聖雄，〈二二八的另一種視野：從蔣中正日記還原派兵赴臺的過程〉)

有關228事件死亡的人數，因當時戶籍資料並不完整，因此各界推估的數目不一，較常被引用的數據是1992年「行政院228事件研究小組」委託學者以人口學及統計學的方法所推估，受難死亡人數大約18000人至28000人。至於「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基金會」後來受理申請，經過「審查」後所認定的受難人數，自1995至2015年8月為止，該會審理通過的二二八事件受難案總計2,288件，其中「死亡」類案件684件、「失蹤」類案件178件、「其他」類（包括監禁、受傷或名譽受損等）1,426件。(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基金會」網站 <http://www.228.org.tw/pages.aspx?v=82D4F7824F7815C6>)

(2) 戒嚴時期白色恐怖:

國府撤退台灣之後，為了確保以蔣介石為權力核心的黨國體制得以在台灣鞏固其威權統治，在戒嚴期間(特別是1950-1960年代期間)，長期發生明顯的人權迫害事蹟，其施加的對象以共產主義者、台灣獨立者與民主運動人士居多。關於上述白色恐怖期間台灣民眾遭到逮捕槍決的死亡人數(包含外省人與本省人的族群背景)，迄今尚難以定論。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指出，若「依據行政院法務部向立法院所提的一份報告資料，顯示在戒嚴時期，軍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達29,407件，無辜受難者約達14萬人……。又據國防部於2005年7月31日呈給總統的『戒嚴時期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報告，合計遭受審判有27,350人，經篩檢剔除重複後，計有16,132人。又據『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的公布，已有8,767人申請補償(至2009年6月30日止)，但實際被捕人數到底有多少？至今仍然沒有定論。其中也

有非政治案件，卻以匪諜或叛亂案件而逮捕者。因性質難分，數量就難以釐清。」至於，長期研究蔣介石父子的陶涵，在其書中指出：「戒嚴期間官方宣布的抓人數字是兩萬九千四百零七人，如果王昇估計大約百分之十五被逮捕者遭到槍決是正確無誤，那麼這三十八年間，處死的總數在四千五百人左右。」(資料來源：張炎憲，〈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2013。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site/yanxian1947/lun-wen/baisekongbuyuzhuanxingzhengyi>；陶涵，《蔣經國傳》，頁 230)